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研究所主编



中国民族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1891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118918

责任编辑：马大正 周用宜

责任校对：李宗贤

封面题字：李力生

封面设计：张 明

版式设计：韩 锐

中国民族史研究

ZHONGGUO MINZUSHI YANJIU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125印张 435千字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统一书号：平11190·187 定价：平3.75元

目 录

祝贺翁独健教授学术活动五十年——代前言

《中国民族史研究》编辑组…………… (1)

《心史》中记载的阿合马被杀事件——兼论

《心史》真伪问题……………杨志玖 (11)

曳刺之由来及其演变……………蔡美彪 (22)

元述律杰事迹辑考……………方龄贵 (35)

八思巴传略……………王辅仁 陈庆英 (61)

试论元朝蒙古皇室的联姻关系……………罗贤佑 (82)

略论宋蒙关系……………任崇岳 (99)

元初朝廷与西北诸王关系考略……………刘迎胜 (118)

元初对西藏人口等的普查

及其经济意义……………黄 颢 (135)

关于阿力麻里、普剌、叶密立

三城的调查及探讨……………张承志 (149)

论铁木真与王罕的联盟……………高文德 (163)

金元之际的蒙古与高丽……………郝时远 (178)

论脱欢、也先与脱脱不花的联盟

——瓦剌兴衰史探究之二……………白翠琴 (201)

从板升到库库河屯的建立……………薄音湖 (220)

清代蒙古封建等级制度初探……………蔡志纯 (231)

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杨绍猷 (246)

清前期卫拉特蒙古进藏熬茶考述·····	蔡家艺 (265)
阿玉奇汗简论·····	马汝珩 (282)
再论渥巴锡·····	马大正 (300)
商代民族和民族关系·····	田继周 (314)
高山族古代史的几个问题·····	陈国强 (330)
试论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对邻族战争的	
制胜之道·····	林 幹 (345)
试论魏晋时与匈奴有关的诸胡·····	周伟洲 (357)
隋唐时期室韦区域东至考·····	杨保隆 (376)
论薛延陀汗国与唐朝的关系·····	段连勤 (397)
八四〇年回鹘西迁辨析·····	魏良弢 (422)
辽朝与奚族的关系·····	孟广耀 (433)
论西夏使臣的“蕃号”问题·····	白 滨 (454)
土官土司两类说考疑·····	杜玉亭 (474)
评明代的治黎策·····	卢 勋 (482)
试论八旗在军事征战中的作用·····	陈佳华 (500)
简评济尔哈朗·····	杨学琛 周远廉 (519)
释马法·····	王钟翰 (535)
红军长征经过藏区与党的民族政策	
在藏区的实践·····	周锡银 (543)
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史料价值·····	史金波 (557)
编后记·····	(576)

祝贺翁独健教授学术活动五十年

——代前言

• 《中国民族史研究》编辑组 •

为祝贺历史学家翁独健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我们编辑了这本论文集。现仅就翁独健教授的为人治学，以及五十年来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与贡献，就我们所知道的介绍于次。

一

翁独健教授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县。一九二二年就读于福州英华中学。一九二八年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一九三五年赴美国留学，为哈佛大学博士研究生，一九三八年获博士学位。同年赴法国，入巴黎大学，从汉学名家伯希和习审音勘同之学。一九三九年回国后，历任云南大学、中国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授。

在燕京大学任教时，他同情革命，积极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宣传进步思想，多方掩护燕京大学地下党组织，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新中国万象皆新的局面使他欢欣鼓舞，益加坚定了他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团结全校教师，认真进行教学改革。

一九四九年，他担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一九五一年，兼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一九五六年，兼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

系主任。一九五八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主管社会历史研究室业务，同时兼任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民族史研究室主任、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全力从事民族史方面的组织领导工作。后先担任《辞海》编委会编委，《中国历史地图集》编委会编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中国历史卷和民族卷编委，民族卷民族史编写组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分卷》主编等职务。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他继任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多年，现为民族研究所顾问。

翁独健教授为人正直，敢于坚持真理，坚贞不渝地保持着史学家的高尚品德。一九六六年，《新建设》杂志编辑部就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一文召开座谈会。他在座谈会上挺身为吴晗同志辩诬并指出：所谓《海瑞罢官》是影射现实的议论，超过了学术范围。在讨论学术问题时，他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尊重历史事实，忠实于自己的观点。

翁独健教授是我国有影响的历史学家，是蒙元史、民族史的学术领导人之一，历被推选为有关学术团体的领导或名誉领导。他现在是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长，中国蒙古史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国际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理事、副主席等。此外，他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翁独健教授还历任第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历届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翁独健教授积极要求进步，对党由敬仰、热爱到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于一九七九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

翁独健教授五十年来的事业和学术活动，约可分为建国前后

两个阶段。建国前侧重教学和研究，建国以来侧重学术组织领导、拟订研究规划、主持集体研究项目、培养人才、从事学术活动等。由于对事业抱有极大的热忱，认真对待工作，两个阶段都有很大的成就和贡献。

建国前十年，即自海外留学归国时起，是他主要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的阶段。

在教学方面，他在大学以讲授蒙元史，中亚、东亚史为主，以他渊博的学识，先后开了辽金元史、亚洲史概论、东亚近代史、俄国史、中亚历史语言研究、中亚语言指导研究、中西文化关系、史学方法、史学实习等多种课程，包括了蒙古史的多数边缘学科，尤其是和蒙元史研究关系很大的中亚语言。他擅长教学，传授知识、启迪智慧与培养独立工作能力并重，使受教者得以成为有用的人才。

在这十年当中，翁独健教授在学术研究方面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和同时代的韩儒林、邵循正两先生，在三、四十年代，各以开创性的成就，把我国蒙元史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达到了新的水平。他们的成就和贡献，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称道。

新阶段的蒙元史研究有两个特色：一是史料应用范围的扩大；一是研究方法的改进，即着重采取史料校勘、史实考订和译名勘同等专业研究方法。这两种特色，尤其是后一种，突出地反映在翁独健教授在当时发表的论著中。

《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在《史学年报》第三卷第二期发表。这篇文章，通过大量史料的对比研究和绵密的考证，指出了两书爱薛传中疏谬之点多处。这篇文章在当时发表，标志着元史研究必须运用新方法才能真正有所前进。两书的作者柯绍忞、屠寄先生继续走重修《元史》的研究道路，虽各有很大的成就，但他们创新元史的努力，终因有所局限，不免在取材叙事上出现疏漏，或在通过非专业的译人利用域

外史料时，常有谬误。另辟途径，别开生面，遂成为元史研究上一种新的需要。《订误》一文的发表，就是从这种需要出发的。关于《元史·爱薛传》，翁独健教授在哈佛大学留学时已有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即以《爱薛传研究》为题，成功地论述了爱薛其人对蒙古统治集团接受西域文化影响所起的媒介作用，及与之相关的问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罗依果教授近年见到这篇在约近半个世纪以前所写的文章，认为仍有价值，要求翁独健教授允许在国外刊印。《爱薛传研究》是用英文写作的，国内尚无著录。

《斡脱杂考》于一九四一年六月在《燕京学报》第二十九期上发表。这篇文章对散见于诸史，用法分歧的“斡脱”一词，根据大量史料进行研究，指出了这一词的各种含义和语源。在旧日的史文中，一个语词，常因著作者使用上的疏误或欠确切，影响史实的正确理解。元史仓促成书，又是出于众手，这样的例子尤多。翁独健教授抱着用新方法去推进元史研究的目的，所以写了这篇文章。当时，这篇文章为解决元史中类似的问题，提供了范例。

《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纂》刊载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燕京社会科学》第一卷，是翁独健教授的又一精审之作。这篇文章对漠北时代蒙古法的形成，世祖时期法典的纂修与颁行，对《大元通制》、《元典章》、《经世大典》中的宪典以及元朝末期法典的编订，详细阐述了历史背景与过程，穷源竟委，叙次分明。蒙古帝国时期只有单行法令，没有成形的法典。元朝多次编纂，但都是政府原始文牒资料的分类汇集，并非完备的法典。正是这种原因，才使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在所收文牒资料中得到生动的反映。从政治史、法制史、经济史、社会史种种角度来看，这些都是研究元代历史不可缺少的珍贵史料。经过翁独健教授系统地研究和阐述，蒙元时代法典的史料价值和重要性遂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

翁独健教授一向认为，蒙元时代的法典，特别是《元典章》，是开展元史研究必须发掘的资料宝库。在《蒙元时代法典的编纂》一文发表的两年后，他曾在《燕京学报》第三十期上发表《元典章译语集释》一文，为解决《元典章》杂用元代口语（从蒙古语硬译的有时是很奇特的词语）所造成的理解上的困难，作此尝试。虽然只完成了部分译语的集释，但为后来者继续进行这项工作提供了榜样。

翁独健教授取得以上的成就，所凭借的是他的丰富的学识，锲而不舍的努力和善于把中国考据学的朴实传统同近代科学方法结合的治学方法。他的这种素养，得自师承，也来自他自己长期对中外史料互相比勘、研究的辛勤实践。他在大学读书时，就在洪业先生的指导下参加《道藏子目引得》的编纂和其他类似的工作。这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留学期间，他又和海外学者如柯立夫等人往来切磋，吸取了他们掌握工具和方法等方面的长处，因此，眼界益加开拓，方法愈为精进。

翁独健教授取得以上的成就，也由于他具有正确的治学态度。他一向认为，谨严治学，实事求是，努力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去丰富本门学科，增加知识文化的积累，是做学问者的本分。不是自问确实有所创获，在前人的成就上跨进一步，不可轻言著作。他坚持这种治学态度，因此，他的著作都以史料丰富、语言精炼、论述有据见长，而且具有创见。

三

建国以来是翁独健教授的事业和学术活动的又一阶段。在这个阶段内，教育行政工作占去了他十年的时间和精力，但他在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作贡献的同时，仍然积极参加学术活动，主持民族史研究方面的工作。一九五六年，他代表民族史研究方面，参加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发展规划的讨论和制订，对十二年

内民族史研究的著作、译著、资料整理项目、人才培养等，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同年十二月，在《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五辑（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上发表《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情况和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向社会系统申述他对开展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意见。他的意见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对民族史学工作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五十年代后期，他极力开展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多次与翦伯赞等知名学者共同组织有关民族史重大课题的学术讨论。全国范围内民族关系史问题的长期热烈讨论，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当时，他还为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选题，组织编写力量，审阅稿件，为普及历史知识作了不少的工作。一九五六年左右，他还抽出时间，组织《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的翻译，自己翻译了该书的第一、二、三章。

从一九五六年起，翁独健教授分工负责内蒙古东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指导少数民族简史简志的编写。在工作中，经常就调查研究的要点、资料的累积和书稿的内容、材料、观点与调查、编写人员交换意见，指导他们的写作。在主编《蒙古族简史》的过程中，他还执笔撰写部分章节，通阅全书，修改文稿，尽力使该书在资料、体例、内容、观点、文字等方面达到应有的水平。

少数民族历史研究十二年发展规划中关于蒙古史研究方面的项目，翁独健教授通过向有关研究单位建议或找人承担的办法，使之尽可能多地落实下来，有的已见成果。如规划中《世界征服者史》、《史集》、《蒙古社会制度史》等外国名著的汉译项目，都是他自己找人承担的，现在均已出版。这些项目，他除了物色译者、指导进行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帮助解决疑难问题外，还为《世界征服者史》、《史集》两书汉译本作序，介绍原书作者的生平、成书的历史背景和书籍的史料价值。

一九七一至一九七四年，翁独健教授负责点校《元史》，领

导一批中青年学者，以百衲本为底本，校对北京图书馆藏原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一四四卷残洪武本及其他版本。一方面进行本书互校，一方面参考有关史料进行校勘，吸取前人的考订成果。在短短几年内，完成了近二百七十万字的《元史》的标点，校勘出书中的讹错千余处，使这个标点校勘本成为现有各种版本中的一个较完善的版本。

经过十年动乱，一九七八年，原哲学社会科学部各所在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下，正式恢复工作。翁独健教授在民族研究所继续分管民族历史研究室业务，积极投入工作。他与室内中青年研究人员分别交谈，帮助选择课题，制订研究计划，鼓励他们加倍努力，夺回十年动乱所造成的损失。在他的安排、指导下，全室研究工作迅速走入正规，大家钻研业务的积极性，在自觉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发挥，并且持续下来。几年来，在民族关系史、各民族历史的专题研究、民族古文字研究、资料整理和协作项目如历史大辞典民族史卷的编撰、中国历史地图的绘制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反映出一定的水平。

恢复工作以来，翁独健教授代表民族研究所和民族史研究会等学术团体，积极参与和主持民族史研究方面及与之有关的各种学术活动。

一九七八年，他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民族研究所召开的民族科学规划座谈会，主持了民族历史科学规划分组座谈，初拟了《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民族历史研究规划》。一九七九年，又在《全国民族研究工作规划会议》上，就全国民族史研究项目的安排、落实，提出建议。同年，在《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又作了题为《加强我国蒙古史研究工作》的报告，回顾和总结了二百多年来我国蒙古史的研究过程、成就与经验，介绍了国外蒙古史研究的现状和趋向，提出了今后的研究任务和努力方向，并强调要采取具体措施，组织力量，系统整理蒙文、汉文、波斯文史料，进行专题研究，培养人才，组成精干的队伍，

提高蒙古史研究的水平。

翁独健教授于一九八〇年十月在元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发言，建议用集体力量，总结国内外元史研究情况和元史专家的成就，编写元史研究史，建议把元史的史实订误工作提上日程。他认为，前人改写《元史》的作法和为《元史》作注或补录的主张都过了时，没有意义，要象钱大昕的《考异》、汪辉祖的《本证》那样，搞史实订误。当然，要作更彻底的元史考证，更全面的订误。他还建议进行专题研究，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哪怕是很小的问题，能解决就有意义。他还联系专题研究，说到治学要严谨，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研究问题一定要透彻，不要急于出文章。

一九八〇年十月，翁独健教授和季羨林、孙毓棠等学者联名发起成立中外关系史学会。在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被选为中外关系史学会名誉理事。他还联合季羨林等知名学者，积极推动民族古文字研究工作，使之获得了很大的进展。

一九八一年五月，翁独健教授主持召开《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在会上作了题为《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提出以下的观点：（一）理解历史上的中国，必须充分注意中国历史上长期发展和变化的特点，不能把王朝和历史上的中国等同起来；（二）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促进中国的发展；（三）对民族关系史上的事件、人物，都应当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学术讨论会上，他又重申了这些观点。他还以同样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看待元朝的历史地位。他在一九八五年《文史知识》第三期发表的《我为什么研究元史》一文中说，评价元朝的历史地位，不能从汉族为正统的观念出发，要从整个历史去看。关于元朝的统治对中国有什么影响，要作深入的研究，说成漆黑一团肯定不恰当。元代对农业相当重

视；社会经济的破坏南北有区别，需要具体分析。从文化交流与发展看，元代文化有所发展，不是倒退；元朝的文化政策比较开放，没有听说兴起文字狱；与中国历代王朝相比，元朝给人以思想比较解放的印象。从宏观来看，元朝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功绩不可否认。

一九七九年以来，翁独健教授在元史、蒙古史、民族史、民族关系史、民族古文字研究等方面的学术活动中所作的讲话和学术报告不下十余次。在此期间，他还先后去法国巴黎参加国际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理事会，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讲学，与哈佛大学等校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去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首府杜尚别参加国际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理事会和《新石器时代中亚地区食物生产问题》学术讨论会。如此频繁的国内外学术活动，都是在七十以上的高龄，健康状况有时欠佳的情况下进行的，他的这种为事业不辞辛苦的精神，使人钦敬。

翁独健教授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尤善于引导后学成才。经常教导中青年研究人员要练好基本功，开扩视野；一贯主张从事民族史研究的人，必须有多方面的学识，除了熟悉中外通史，还应有哲学、地理、经济、法学、军事、文学、艺术、科技常识等多学科的知识修养，并掌握多方面的工具，特别是语言工具，如古汉语、外语和民族语文等。从而全面地、充分地占有和利用各种史料，作勘同比较，吸取前人成果，掌握研究信息，少走弯路。长期以来，他指导和帮助过的民族研究所内外不少中青年研究人员，视野开阔，掌握新知，成为专门学科的新秀，有的还以比较突出的成就在史学界显露头角，被认为是有希望的学术继承人。在他指导下的^①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以扎实的基础走上科研工作岗位，作出了可喜的成绩。

从以上翁独健教授的学术活动可以看出，建国以来，他为开拓元史、蒙古史、民族史、民族古文字的研究局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在他的倡导、组织和直接间接的推动下，这些学科都有了

日渐完备的全国性和地方性的研究机构，日益扩大的研究队伍，有了全国性和地方性的研究规划，有了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学术团体组织。科研成果累累，人才不断涌现。作为我国历史科学、特别是元史、蒙古史、民族史研究领域的学术领导人之一，翁独健教授对我国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目前，翁独健教授虽在高年，仍然以极大的热忱，为从学术研究方面促进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他现在正在领导一批中青年研究人员从事《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的著述，带头承担其他科研任务。他为事业而奋斗不息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今天祝贺他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奉献出这本论文集，意义就在于要向他学习，要继续在他的指导下，努力提高元史、蒙古史、民族史的研究水平。

《心史》中记载的阿合马被杀事件

——兼论《心史》真伪问题

· 杨志玖 ·

元世祖时回回宰相阿合马的被刺杀事件，是当时政治舞台上的一件大事。中国载籍如《元史》，西方载籍如波斯史家拉施特的《史集》、马可波罗的《游记》中俱有记载。三者所记不尽一致，各具特色，治史者据以参证斟酌，折衷损益，足以得出更为全面的认识，中西学者对此已作出了不少有益的贡献。在被人怀疑的南宋遗民郑思肖的《心史》中，也有一处关于阿合马被刺事件的记载，足以与以上三书比较补充。据我所知，《心史》还没有人引述过。现将有关文字摘录，并略加诠释。

一、忽必烈有权臣曰阿合马，回回人也，为伪平章，久擅鞑人一国官职、财赋之权。苛克货利，杀害良善，多夺人之美妻艳女，鞑之内外上下，大以为苦，独忽必烈信任焉。有子四十余人，半有权职。窟宅七十余所，分置子女妻妾。江南内外宝物，俱半匿聚其家。

二、拔都自僭建宫殿于回回地面，暗通接阿合马，将谋响应兵，夺忽必烈之国。阿合马忽命其子亦掌兵权，伪平章张酋深疑阿合马数子皆握重权，令令子更握兵权，意不良。与其党王著谋。

三、著勇不顾身，归家析弃妻子，密用术计。马至，著持金瓜槌竟挝死在地。军民尽分膻阿合马之肉而食，贫人亦莫不典衣歌饮相庆，燕市酒三日俱空。阿合马党矫忽必烈命，杀张酋、王著

等。暨忽必烈知矫命妄杀忠良，蔓及别酋，死者几百人，籍阿合马家生南珠一千八百余石，蓄马十余万匹，家口七千余人，并分徙入诸酋家为奴婢；诸子皆斩剮剥皮，尽拘呼市犬，令食其肉，仍各籍其家，其妻妾奴婢亦分徙入诸酋家为奴婢。且根穷党类，支蔓无辜，打勘索钞犹未已。由是回回不许与鞑靼内外事，亦不许佩刀，出者不许还家。鞑靼人咸壮王著此举，郎主以下欣然施与真北海青衣袄袖三千件，焚而为祭……

四、拔都所据守之地，皆阿合马族类，谋为阿合马报仇，相与拔都大兴兵攻忽必烈。拔都得回回效死，正寇鞑西边，鞑深受其患。^①

拿以上史料和《元史》对照，可以发现，《心史》所载，确有它的特点。

（一）关于阿合马的罪恶，《心史》有“多夺人之美妻艳女”一句，《元史·阿合马传》中无此记载。但《元史·世祖纪》在至元十九年四月丙辰敕令中说：“敕以妻女姊妹献阿合马得仕者黜之。”又至元二十年七月有“敕捕阿合马妇翁尚书蔡仲英”记事，卷一七三《崔或传》有“运使张庸尝献其妹于阿合马”的记载，可为《心史》所说佐证。细心的读者可能认为，按此三例，阿合马的妻女系诸人自动贡献而非仗势侵夺。但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则明言，凡有美妇而为彼所欲者，无一人得免。其手段则以官职诱女之父兄，“由是或因他人盼得高官显职，或因他人畏其权势，阿合马尽得美妇为其妻妾”，^②仍是仗势霸占而来。《元史》是官书，对此等事不便多所宣扬；《心史》是野史，仍是概而言之；马可波罗则以一个猎奇者的眼光，对此社会新闻娓娓而道。这似乎反映了中西道德伦理观念的差异。

（二）关于阿合马的儿子，《心史》说他“有子四十余

^① 《心史·大义略叙》。

^②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中册，341页。